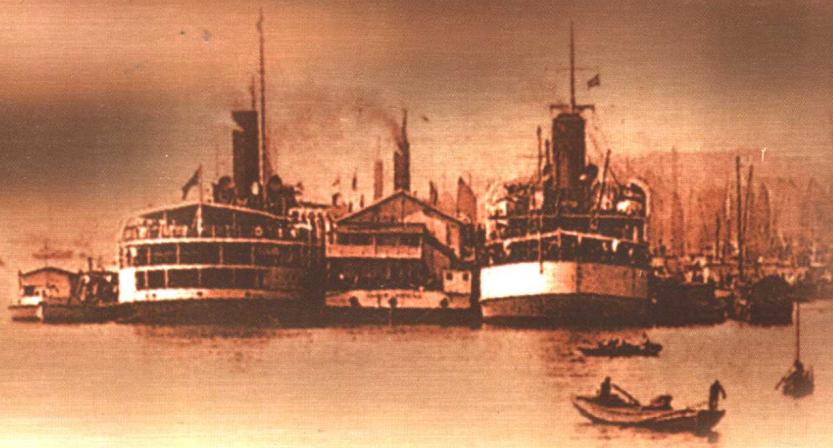


张 生 著

# 白云千里万里



Baiyun  
qianli  
wanli



春风文艺出版社

张生著

# 白云千里万里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张 生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云千里万里/张生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13-2677-9

I . 白… II . 张…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338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社主页: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xuanti.chinachunfeng.net](http://xuanti.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1—20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戚永清 王维良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耿志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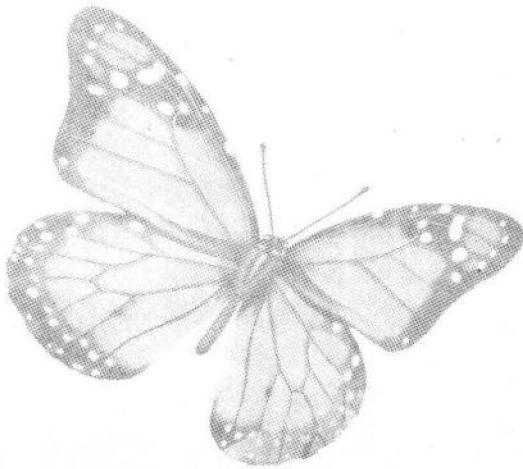
版式设计: 马寄萍

---

定价: 23.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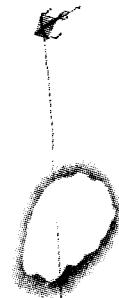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我思想》1937.3



# 第一部

白云千里万里白云千里万里白云千里万里白云千里万里白云千里万里白云千里万里白云千里万里白云千里万里

酒会结束，伯乐从静安寺回到位于外滩的沙逊大厦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一路上的人还很多，南京路的一些大商场的橱窗里，有不少都还亮着五颜六色的灯光，沿途小贩叫卖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让伯乐几乎怀疑起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了巴黎，其实，就是在巴黎，这个时候也没这么热闹。也许，这就是上海？和八年前比起来，上海的高楼更密集了，人也变得更多了，当然，也更摩登了。这一点，他从昨天回到上海起就感觉到了。大街上那些身材窈窕的姑娘的旗袍不仅比过去要紧得多，一侧的开衩也高了很多，举手投足间，无不曲线毕露，风情万种，丝毫不亚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时髦女郎。

伯乐不禁浮想联翩，在他脑海里早已出现过无数次的谭天琴的身影又在他眼前晃动了起来。不过，他从未看到过谭天琴穿旗袍的样子，在法国时，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蒙达尼小城，她都始终保持着国内女学生的装束，总是穿着白衣黑布裙，剪着齐耳短发，也向来不施脂粉，因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他和谭天琴的关系要比这复杂一些，只是，如今时间已过去了这么多年，不知这一切是否已经改变？更何况，就是不改变，谭天琴现在身在何方，能不能再见到她，也还都是未知的事。

八月底，上海的天气已不是很热，但还是有点闷。伯乐进了房间后没有先开灯，而是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推开了狭长的玻璃窗。一股夹杂着腥味的凉风立即刮了进来。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然后在黑暗中点上了一支烟。

黄浦江上，有一艘客轮灯火通明，正在水里缓缓地调头，也许是夜深人静的缘故，翻滚的浪花和发动机的轰鸣声听起来异常清晰。他

知道，如果这时站在船舷上，就会发现岸边的高楼正以一种缓慢得让人眩晕的速度平稳地向后退去。一九二一年的春天，他就是从这里和哥哥伯年一起乘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时他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有谁会想到，当年的那个瘦弱的小男孩，现在已经是个博士了呢？

在今天震旦大学法学院特地为他举行的晚宴上，校方代表，一个法国人，不仅亲自将教授的聘书交到他手里，还一再向新闻界的来宾介绍，像马伯乐先生这样，如此年轻就能拿到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即使在法国的青年里也是很少见的，因此，马先生可以说是个天才，而他能到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执教，当是学校的光荣，可以想象，马伯乐博士一定会为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他的话讲完后，立时掌声四起。在众目睽睽之下，伯乐也只好向大家点头微笑，以示感谢。但他内心却觉得震旦搞的这个仪式有些过于隆重了，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这么年轻拿了个博士学位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他所拿的这个法学方面的学位，并不是他真正喜欢的。那些枯燥的条文，逻辑严密近似文字游戏的表述与推理，其实他一直都很不感兴趣，不仅当年不感兴趣，就是现在拿到博士学位了也仍然是不感兴趣。可世间的事就是这样，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干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有时还是自己最不擅长的事，就像他，本来就拙于言辞，可现在却偏偏要走上讲台当老师，靠卖嘴皮子吃饭一样。他想想就觉得滑稽。

手上的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了，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手指弹开盒盖，只听见轻轻的一声当之后，蓝色的火苗砰地燃烧起来。他把打火机在手里转了转，又点上了一支烟。

这只打火机是德国的一个名牌，钢质的，银色，造型很简洁，有两个火柴盒并在一起那么大，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还是临别时他的房东杜布瓦先生送给他的。打火机是杜布瓦先生大战期间死于德国战场的独生儿子弗朗索瓦生前的遗物，老头子把这只儿子心爱的打火机送给伯乐，也表达了他对伯乐的那种无法言表的感情。

虽然事先早有准备，可在他提着行李离开家门的时候，杜布瓦的夫人，一个才五十多岁就已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她满脸是泪，紧紧抱住伯乐，不停地叫着他的名字，似乎伯乐的

离去就意味着悲伤，意味着永别。虽然的确也是永别。

他也哭了，要是没有这两个善良的老人，不要说在法国攻读什么博士学位了，就是饿也要把他饿死。这么多年来，多亏他们的照顾，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才使他得以心无旁骛地读书。而其中的原因不过是长得有点像杜布瓦先生阵亡的儿子。记得他当初一个人拿着出租房子的广告敲开杜布瓦先生家的房门时，老太太居然盯着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年龄太小让老太太吃惊，后来，老太太才告诉他，当他出现在面前时，她还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死而复生了呢。所以，没有多加思索，她和丈夫就将房子以很低的价钱出租给了他。

这确实让人有些难以置信，可看了弗朗索瓦小时候的照片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真的很像老太太死去的儿子。所不同的只是一个金发，一个黑发罢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恍惚从老太太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模糊的影子。

老太太把儿子留下的衣服送给他穿，把儿子空着的房间给他使用，还做儿子喜欢吃的菜给他吃，就像他真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有时，她还会端着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他旁边，看他看书，或做笔记。当伯乐抬起头来休息时，她就会把咖啡递给他。

“亲爱的伯乐，我觉得，不，你就是弗朗索瓦，真的，你和我的弗朗索瓦就是同一个人。如果弗朗索瓦活着，他也一定会认为你就是他的。”

老太太微笑着对他说。伯乐接过老太太递过来的咖啡，也对她笑了笑，说了声谢谢。他知道，老太太这样说，并没有别的意思。她只不过是想说明，她很喜欢伯乐罢了。

杜布瓦先生则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他并未因伯乐年龄小就把他当成小孩子，他对伯乐很客气，一直叫他马先生。杜布瓦先生是个医生，每天很早就到诊所去，回来也很晚。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他才待在家里，这时，他也会和伯乐谈几句，不过，他从来不谈诊所的事，谈得更多的还是和医学无关的话题。伯乐发现，他并不像很多法国人一样，对中国一无所知，而且，他也并不是一个刻板的人，他对文学、历史和哲学都很感兴趣。有一次，还主动和他谈起了老子和庄子。他觉得，这两个人都充满了智慧，尤其是庄子，他讲了那么多有

趣的故事，比如像他和蝴蝶的那个寓言，就很耐人寻味，有谁会在自己做梦变成一只蝴蝶后突然迷失自己，竟会觉得自已也许是一只蝴蝶的梦想里的一个道具，或一个布景呢？

杜布瓦先生一本正经地对伯乐说，现在他们相遇，在这里聊天，很有可能也是一场梦。

“不过，在这个梦里，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又会干什么，我们是谁？却不知道，甚至，很有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伯乐看了看手里燃烧着的香烟，不禁感到一丝迷惘，这迷惘，就像在月光的映照下从江中飘起来的淡淡的雾气，尽管若有若无，但却能闻到和感受到它那挥之不去的气息。

从黄浦江上刮来的风变得更凉了，月亮也升得更高，而那艘轮船好像已经驶离了外滩，在波光摇曳的江面上，似乎一切都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⑨第二天，伯乐就搬到了学校为他在吕班路租下的一处石库门房子里。这个地方离霞飞路不远，办事方便，震旦就在吕班路上，也很近，而且，四周的环境很清静，除了不时有一路空空荡荡的有轨电车丁零丁零地驶过外，没有更多的车辆和行人。这一点，伯乐尤其满意。在法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发现自己惟一喜欢的就是那里的安静，即使是在巴黎，也很静，那些灯红酒绿，那些音乐，似乎也并不喧嚣，倒反而让人觉得它的背后所埋藏的深深的静谧。但上海，他才不过回来了几天，就感到了一种纷乱与吵闹，虽然是一样的霓虹灯，一样的鸡尾酒、爵士乐，可却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也许，在法国的时候，他是个异乡人，一切都与他无关，而回到上海后，所有的东西都已改变，他与一切都有关了。

因为离开学还有几天，在新居安顿下来后，伯乐推开了一些朋友的邀请，买了张宁沪快车的车票，决定先到镇江去看望一下哥哥伯年。自从一九二一年秋天伯年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后，他们兄弟也将近有八年没见了。

时间过得真快。但一切都还像是发生在昨天。当初伯年中学毕业后，受了报纸上宣传的蛊惑，向祖父讨了一笔钱，带着他从偏僻的四川赶到了繁华的上海，来谋求新的生活。他们本想找个学校读书，可

谁知刚到上海伯年就遇到了过去的一个同学，说是现在华法教育会正在招生，只要交一笔钱就可到法国勤工俭学。这位同学介绍说，因为受前些年欧洲爆发的大战的影响，法国的青壮年死了很多，所以很缺劳动力，到了法国后可半天工作，半天学习，而且，法国生活费用不高，教育质量却又在中国之上，再说，又有华法教育会统一安排，到法国留学应该是十分便利可靠的。他告诉伯年，他们的朋友中，已经有好几个人已经走了。他也准备立即就随下一批人走。

华法教育会是由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发起的，原来是一九一五年成立的赴法勤工俭学会，一直鼓吹中国青年到法国去，一边做工，一边读书。这点伯年也是知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元老吴稚晖对此就讲过一句开玩笑的话，说是只要能出去留学，哪怕这些勤工俭学生回来改良厕所也是好的。他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后，感到很幽默，还对伯乐提过。只是他不清楚到法国去留学如此容易，只要交上几百大洋，不问年龄，不问学历，就可留学，这让他和伯乐都又惊又喜。

伯年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和伯乐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刚好这一批即将赴法的勤工俭学生还有很多空余的名额，他们赶到霞飞路的华法教育会后，很快就办好了手续。但办好手续后，兄弟两人却发起了愁，这还是伯年最先想到的，他对伯乐说，既然是到法国勤工俭学，可他什么都不会，靠什么来做工呢？看来只能当个搬运工，到工厂里打打杂，出出苦力了。他很担心伯乐，年龄这么小，没什么技术也就算了，还没力气，到时候肯定很麻烦。

对这件事，伯乐倒不是很头疼，他叫伯年给他买几支毛笔和彩色的颜料，再买一把合用的小剪刀。他告诉伯年，实在不行，他可以为人剪纸或画画。这个本事还是他从小跟着祖父学会的。祖父不仅是个石匠，能雕善刻，还心灵手巧，是个专门做纸扎的师傅，他平时给人做办丧事时用的花圈，逢年过节则扎花灯，画门神，因为做的东西栩栩如生，精巧异常，而远近闻名。伯乐很小就开始跟着祖父在家里剪剪画画，有时候还和祖父一起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地方去给人做这些玩艺。祖父闲下来的时候，也手把手地教了他很多画画和剪纸的窍门，所以，伯乐才产生了这种想法。

伯年听了他的打算后，不禁哑然失笑，法国人怎么会喜欢中国农

村的这些土玩意儿呢。但他说归说，还是按伯乐的要求，给他买了那几样东西。

如今看来，伯年的意见是对的，他到法国后，根本就没有把那几支笔和颜料，还有那把刃口锋利的“张小泉剪刀”拿出来过，因为到了那里才知道，不仅无工可勤，更无学可俭。等着他们的是一场勤工俭学生们企图谋求中国政府资助，设法获得公费留学资格的学潮。

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来到了法国，随着留法的人越来越多，华法教育会已没有能力再予以安排，而且，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大多都比较贫寒，所以，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争取政府的同情，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设在里昂用以接收公费留学生的中法大学，要求得到同等待遇。而在勤工俭学生们集中的蒙达尼小城，领头的就是谭天琴，还有她的好友王志钧等几个人。

王志钧讲着一口大家听不太懂的湖南话，神情激昂，富有鼓动力。他长发披肩，穿着一身略显陈旧的黑西装，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站在人群高处，挥动胳膊，大声疾呼，要勤工俭学生们团结起来，到里昂向校方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就像是一个指挥家在指挥一场交响音乐会，王志钧的话刚一说完，他的女友谭天琴高亢的嗓音就响了起来。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大家也跟着喊起了口号。

伯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十分激动。而伯年已是识途老马，早在一九一九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四川时，正在重庆读书的他就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所以他不只是激动，还迅速开始了行动，不久，他就深深地卷进了这次请愿活动中。

结果谁也想不到，伯年就像到法国去做了一次自费旅游，只在法国待了三个多月，连法国话都没学会几句就又重新回到了中国。

他们到里昂中法大学示威时，突然被法国警察包围，随即被强行遣送回国。事后，伯乐才听人讲，那些警察是中国大使馆要求法国政府派来的。而伯乐之所以幸免于此厄，是因为他那两天在害痢疾，几乎拉得浑身脱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好留在蒙达尼养病，才躲过了这一劫。

但当时伯乐却不这么认为，在他得知伯年被法国警察抓住并遣送回国后，一下子六神无主，眼泪都流了出来，他甚至后悔没和伯年一起去里昂，这样即使被遣送回国了，他干什么事也会有个依靠。现在他举目无亲，待在蒙达尼这个是非之地，不由得感到惴惴不安。好在他和伯年带来的钱还有一些，病好后，他就离开了蒙达尼，一个人到了巴黎。

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事先真是一点也不会想到，更不会相信。那一套毛笔，颜料，还有那把精巧的“张小泉剪刀”，在他回国时，因为实在没有东西可送，就把它们从箱底翻出来，准备送给杜布瓦先生作纪念。由于巴黎的天气比较潮湿，包好后又一直没有打开过，那些颜料已经不能用了，毛笔的笔头也已脱落，只有那把“张小泉剪刀”还是好的，虽然它的刀口有点涩，上面也有些锈迹，可并没有坏。伯乐就去买了一些红色的油光纸，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用这把剪刀剪了很多剪纸送给了杜布瓦先生。这些剪纸中，既有腾云驾雾的龙凤图纹，也有吉祥如意和幸福长寿的字样，还有抱着一条大鲤鱼的憨态可掬的胖娃娃，伯乐边剪边向坐在一旁观看的杜布瓦先生和太太解释其中的含义，然后把那个精致的小剪刀一起送给了他们。

两个老人非常开心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可伯乐却觉得不好意思。与两个老人多年来对他的无私的帮助相比，这些东西太微不足道了。

同样，他能带给这些年来不断鼓励和帮助他的兄长伯年的，也不过是一声简单的问候而已。

镇江的火车站很小，但下车的人却很多，出了站后，伯乐叫了一辆黄包车，把伯年部队驻扎的地址告诉了车夫，车夫说就在金山脚下，很快就能到。但他蹬了很长时间也没到。也许是头一回来镇江，比较陌生，伯乐觉得镇江这座城市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小。镇江的街道不宽，可一路上粗大的梧桐树，匝地的绿阴，和临街的三三两两的西式小楼，给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异国的情调。

对于伯年从军，伯乐是没想到的。当他在巴黎接到伯年的信，说他回国后辗转到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时，他还有些不理解，因为伯年过去给他讲的都是科学救国那一套道理，从来没说过要当兵，要打

仗救国的。伯年回信说，他以前的观念没错，但现在最需要的还是推翻那个腐败的旧政府，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他难以想象，那个在里昂纠集法国警察把勤工俭学生强迫押回国家的政府，会真心为民众谋福利。

他还建议伯乐学习法律，因为建设和改善一个国家，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伯乐后来改学法律，与伯年的反复劝说有很大关系。

到了军营大门后，伯乐付钱下了车。天很热，他的衬衫已经湿了，他脱下外面的灰西装，搭在了胳膊上。门口全副武装的哨兵问他找谁，他说他是马伯年的弟弟，要找马伯年。哨兵听了他的介绍后，忽然脚一并，啪地给他敬了个礼，让他吃了一惊。

“请稍等，我马上向团长通报。”

伯乐这才明白过来，伯年已经做到团长了。因为伯年从没有对他说过自己的军衔，他还以为伯年只是个连长之类的尉官。

过了一会儿，只见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里面快步走了出来。走在前面的那个圆脸的小伙子个头还很小，年龄也很轻，一把一尺多长的盒子枪在他身体一侧晃个不停，后面的那个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穿着一身整齐的灰布军装，戴着军帽，扎一条棕色的宽牛皮腰带，微笑着向他摆了一下手。

伯乐愣了一下，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来，这个人竟然就是过去那个个子瘦高的伯年。他赶紧叫了一声大哥，迎了上去。之前，他还以为，兄弟八年未见，要是有朝一日能够重逢，他们肯定会像过去那样亲热得不得了，说不定还会拥抱在一起，流下眼泪，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心情虽然激动，可人却很平静，而性格一向活泼热情的伯年也只是远远地伸出了一只手，和他握了握就松开了。

“长得和我一样高了，也结实多了。”在阳光下，伯年眯着眼睛说。

“你也一样呀，”伯乐说，“就是人变黑了。”

伯年笑了。

“工作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已经提前领了一个月的薪水了。”

他看见那个小伙子也在旁边对着他笑，就问伯年他是谁。

“怎么，他你也不认识了？我说你就想起来了，”伯年指着这个小伙子说，“他就是姨妈的儿子小新，小时候你还带他一起玩过呢。”

“哦，原来是你，”伯乐笑了，他想起小新小时候拖着鼻涕到处和人打架的样子来。

小新接过了他的衣服，腼腆地问了他一声好。

晚上，伯乐和伯年聊到很晚才睡觉。但伯年对自己的情况讲得很少，主要还是在听伯乐聊，他似乎对国外的任何消息都很感兴趣，不仅关心法国，还有德国和苏联的政治现状，甚至还问起了蒙达尼小城的那家最大的面包店是否还在，那里的羊角面包是否还很好吃这一类的问题。

伯乐一直很想从他嘴里打听到谭天琴的下落，听伯年提到蒙达尼，他就顺口问伯年，当年那些和他一起被遣送回国的人现在都在哪里。伯年简略地说了几个人的情况，无外乎升官发财，死于非命，其他的人却语焉不详。

“王志钧和谭天琴呢？”伯乐忍不住问。

“他们两个，我倒是不清楚，”伯年沉吟了一下说，“从法国回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从此，我也没再见过他们。有好几年，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一度还以为他们失踪了。后来听说王志钧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春天，在上海，他还组织过工人暴动，有人看见他拿着枪在指挥人攻打警察局。谭天琴就更不了解了，估计她还和王志钧在一起吧。”

“那现在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上海呢？”

“不知道，后来在汉口、广州，都有人看到过王志钧。他如今在共产党里好像是个大人物，也是个危险人物，政府正在通缉他，如果抓住他，肯定要枪毙。”

夜已经很深了。聊了这么长时间，伯年似乎也疲倦了，他在床上翻了个身，不再说话。伯乐只好也跟着睡了。

第二天，伯乐醒来时，伯年已不在房间里了。他轻轻拉开屋门，看见小新跷着二郎腿坐在门外的一张椅子上，手里正拿着一根马鞭在玩来玩去。看到伯乐，小新忙站起来告诉他，伯年今天早上临时到城里去开一个会，很快就回来。伯乐点点头，小新立即去端来了洗脸

水，然后又送来了一份早餐。

果然，没过多久，伯年就回来了。他说他已经向金山寺的长老打了招呼，中午到他那里去吃饭。金山寺的素斋很有名，应该去吃一顿。

伯乐问他，这个金山寺是不是《白蛇传》里的那个金山寺，伯年说是，那里还有法海和尚面壁的山洞，当初白娘子水漫金山，淹的就是这个金山寺。

小新牵过来两匹马，等伯年和伯乐骑上去后，自己也骑了一匹马跟了上来。金山寺的长老已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到伯年他们过来，忙双手合十行了个礼。伯年向他介绍了伯乐，长老恭维了几句，然后带着他们在庙里转了转。金山寺倚山而建，规模宏大，确实是一所千古名刹。再加上又有《白蛇传》这样动人的民间故事的宣扬，所以善男信女很多，香火也很旺。

转完几座大殿后，伯年提出要带伯乐登一下山顶的宝塔，长老说好的，就叫一个小和尚拿钥匙去开门，让他们自己上去。小新看伯年没有叫他，就留了下来。

伯年带着伯乐爬到山顶，沿着塔内一级一级狭窄的木梯登上了最高的一层。从闷热阴暗的塔身里钻出来后，伯乐不禁大叫了一声痛快，在呼呼的风声中，长江在烈日下无声地流淌着，宽阔的河面犹如一匹平滑的绸缎，上面帆影点点，让人顿觉豁然开朗。

伯乐掏出一支烟，背转身点上。伯年好像也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他弓着腰，扶着栏杆，望着远处的江水，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伯乐，他怎么看《白蛇传》里的法海和尚。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没头没脑，伯乐感到很奇怪，他看了伯年一眼，觉得伯年好像是在开玩笑，就说，如果不从道义出发，也就是不考虑白蛇和许仙的感情，法海那样做也是对的，因为白蛇毕竟不是人而是妖，她勾引许仙，本身就犯了戒律，即使不是法海，也会有别的人对她作出惩罚的。所以也不能说法海一点道理也没有，或者说他就是个坏人。

伯年听了，点了点头。他接着又问伯乐知不知道母亲的事。

伯乐摇了摇头，母亲因病去世时他还很小，才刚满两岁，长大后他也很少听人讲过母亲，对母亲的情况他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是

他不明白，伯年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想起母亲来。也许是看到了长江？从他们家附近流过的那条嘉陵江的水远比这里要清澈得多。

“其实，母亲没有死，”伯年把头重新转了过去，山脚下的江水依然在缓缓地流动。“当年，父亲在采石场被山上的滚石砸死后，没多久，母亲就和邻村的一个人有了私情，这是很丢人的事，被发现后，那个男的被村里人捆上石头扔到了江里。按照规矩，本来也是要这样处理母亲的，可因为祖父四处求情，她才免于一死，但还是被带到重庆交给了人贩子，让人贩子把她卖到了很远的地方。”

塔檐上的风铃在风中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它细碎，杂乱而没有韵律。伯乐很惊讶刚才没注意到它刺耳的响声。

“给我支烟，”伯年对伯乐说。

伯乐忙取出一支烟递给他，然后拿出打火机给他点火，可点了很多次都被风吹灭了。后来还是伯年要过火机点上了烟。

“我们到法国留学的钱，有一部分就是母亲的卖身钱。”

伯年不会抽烟，才抽了一口就被呛住了，他索性扔掉才点上的烟，扶着栏杆吭吭咯咯地咳嗽了起来。

等他们从塔上下来时，伯年已恢复了平静，不再咳嗽。他清了清嗓子，对跟在他后面沉默不语的伯乐说，“我以前曾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把迫害母亲的那些人都扔到江里喂鱼，或把他们卖到哪里去做苦力，可现在想想，他们当时也是不得已，这个念头慢慢也就没有了。”

伯乐这才醒悟过来，伯年为什么要问那个关于法海的问题了。可人的感情又怎么能是法海所能控制的呢？

刚才给他们开门的小和尚已经等在下面了，他告诉伯年，饭准备好了，长老等着他们快点下去吃。伯年说好的，叫他先下去，他们随后就来。

这时，伯乐想起一个问题，他问伯年，能不能搞清楚母亲被卖到哪里去了。

伯年紧紧腰带，正了正帽子，苦笑了一下。

“这怎么可能知道，重庆那么多人贩子，是哪一个人把母亲卖了的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弄清楚母亲被卖到哪里了，很可能，这一辈子也找不到她了。”

可能是伯年打过招呼的缘故，这顿素餐很丰盛，花样繁多，味道也很好，在此之前，伯乐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能用豆制品做出这么多的菜来，但他却吃得很少。伯年也一样。只有小新的胃口还可以，亲自作陪的长老每介绍一个菜，他就立即将筷子伸过去，多少给了长老一些面子。

当天下午，伯乐就搭火车回了上海。伯年本想再留他住两天，陪他到扬州去玩一玩，可他却突然兴致全无，就以学校马上要开学为由拒绝了伯年的好意。

不知怎么搞的，伯乐觉得这次镇江之行好像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愉快，与伯年见面固然很好，可也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伯年似乎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但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他却又说不清楚。也许就是这一点，让他产生了这种隐隐的不悦。

还有就是母亲的事了。母亲多年来在他记忆中只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影子，有时他甚至已经将她全然遗忘，如今突然得知了真相，而且还是这么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他实在是心烦意乱。以至于当天深夜回到上海后，虽然人已很疲倦，也一直未能入眠。在床上好不容易折腾到天色大亮，他才因为极度疲乏闭上了眼睛。

可即使这样，他也仍然没有休息好，他不停地做梦，这些梦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就像一列火车从隧道深处源源不断地驶出，而在每一节车厢里，也就是在每一个梦里，他都能清晰地回忆出它的内容，还有它的颜色。在这似乎无穷的梦境中，总是有一个女人若隐若现，但这个女人并不是他可怜的母亲，也不是善良的杜布瓦太太，而是一个面色苍白身形瘦削的女人，他看不清她的脸，这个女人在他眼前晃动着，一步步向他走来，却又始终和他有段距离，怎么也走不近他。

尽管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一定认识这个女人。伴随着这个女人出现的是一片透明的黄色背景，这让他想起祖父制作的五颜六色的走马灯，随着灯罩的旋转，它的光芒也在不断地变幻着颜色，赤色、橙色、黄色、绿色，还有青色，蓝色和紫色，有时它们会变成一团模糊的白光，可很快就会被一片灿烂的金黄所代替，它闪烁着，就像水里的夕阳，但更像成长在他的故乡的漫山遍野

的油菜花，那些比燃烧的火还要耀眼的，永远在风中摇曳着的，同时也是永远也数不清的一串串明黄色的花朵。

伯乐醒来时，天色已近黄昏。窗外的光线也暗淡了下来。他从床上坐起来后，又想了一会儿，可还是想不出梦里的那个女人是谁。他到盥洗间冲了个澡，让自己清醒了一下，既然多想也没什么用，他就把这个梦撇开，准备到外面吃点东西。一天没吃饭，他想他也该饿了。

出门时，他看见信箱里有封信，就拿出来看了看，是本埠来的一封快信，但上面既没有落款也没有地址，他犹豫了一下，又把它塞到了信箱里。这两天，他太累了，很想清净清净，再不想有什么事来让自己烦心了。

在路边，他等了很长时间电车也没有来，黄包车也一辆没有，他就干脆沿着安静的吕班路走到了霞飞路。霞飞路倒是很热闹，电车来来往往，上面坐满了人，还有不少小汽车也在路上行驶，忽然鸣响的喇叭常常把在车头前穿梭的行人吓上一跳。街灯也已经亮了。

伯乐顺着霞飞路往西走去，走了两三站路后，找到一家西餐馆吃了顿晚饭，饭后，他又给自己要了一杯酒，喝完后，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从原路走了回去。这么一晃荡，他的心情好像也好了些。回到家后，看时间还早，他就找出几本从法国带回来的参考书，一边看一边备起了课。

第二天起来后，他又伏案工作了一上午。到了中午，他还是像昨天一样，准备到霞飞路的那家西餐馆去吃饭。离家时，他从信箱里把那封信拿了出来，因天有点热，他就没有再走过去。

上了电车后，他找了个座位坐下，然后拆开了信。原来信是他在巴黎时的好友张子云写的，他说他从《申报》上看到了震旦大学举行晚宴欢迎他的消息，就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给他写了这封信。在信里，他给伯乐留下了他的地址，希望伯乐去找他。刚好他就住在霞飞路上，不是很远，伯乐思友心切，决定立即就去拜访他一下。

子云年龄比他大，但去法国却比他晚，因为家境比较富裕，又对画画感兴趣，家里就把他送到法国来学艺术，伯乐就是在投考巴黎美术学院时认识他的，当时考场里就他们两个是中国人，所以考进美院后，两人很快就亲近了起来。后来，虽然伯乐离开了美院，可他们来